

## 廖平與蒙文通——以經學為中心

蔡方鹿\*

### 前言

晚清今文經學大師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人）在中國經學史和近代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國學大師蒙文通（1894—1968，四川鹽亭人）以廖平為師，繼承發揚師說，受到廖平思想的深刻影響。但在對待古文經的真偽、《公羊》學的託古改制說以及與之相關的今文經學之革命說等問題上，廖、蒙二人的思想卻存在著一些分歧和差異。與其師說有所不同，蒙文通把清代今文經學分為兩派，其中繼承西漢今文經學，講《公羊》學的一派遭到蒙文通的批評，而他對晚清今文《公羊》學的批評是與對西漢董仲舒今文學的批評聯繫在一起的。他以今文經學的革命說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凡繼承、沿習漢代《公羊》學，宣揚改制說的便遭到蒙文通的批評，這與晚清近代以來康有為等借今文學以宣傳變法改制、主張君主立憲與孫中山、章太炎等主張共和、民主革命相互之間的政治鬥爭有關。弄清廖平經學對蒙文通思想的影響，以及兩人經學思想的相同相異之處，對於把握中國經學在清近代的發展演變以及在社會轉型時期經學受時代政治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 廖平經學對蒙文通的影響

蒙文通受廖平經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繼承廖平，闡發師說並加以發展等方面。晚清今文經學的著名人物廖平在經學研究上提出以禮制平分今、古文經學，

---

\* 四川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

後又尊今抑古，這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蒙文通繼承廖平，闡發師說，亦提出己見，加以發展。

蒙文通以廖平為師，其經學受到廖平思想的深刻影響。廖平是晚清今文經學的著名人物，並對康有為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廖平早年習宋學和八股文，後入尊經書院習漢學，注重字義考證和音訓。光緒五年（1879），治《公羊春秋》的今文經學家王闓運入川主講尊經書院，廖平改從師王闓運治今文經學，尤重《春秋》，然與其師王闓運重《公羊》有所不同，廖平重《穀梁》，但對廖平經學產生重要影響的仍然是《公羊》。廖平早期思想發生過兩次轉變：第一次是否定宋學，而接受乾嘉漢學；第二次是否定乾嘉漢學，而接受今文經學。經過這兩次轉變之後，廖平思想進入了他的經學六變時期。

廖平經學思想凡六變：第一變是平分今古，即平分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認為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區分的根本在禮制，今文經學所言禮制是以殷禮為主的四代（虞夏殷周）之制，集中見於孔子所著的《王制》；古文經學所言禮制為周禮，主要見於《周禮》。周禮本於周公，《王制》為孔子手定，故有古文經學宗周公，今文經學祖孔子之說。第二變是尊今抑古，認為只有今文經學才是孔子真傳，中國學術從戰國到西漢哀平以前，全是今文經學的派別，尊孔子，宗《王制》，無有不同。古文經學則是劉歆在西漢末年的偽纂，《周禮》是劉歆作偽的主要經典，目的在迎合王莽篡漢，劉歆作偽後，才有所謂的古文經學，而今存《漢書》等書中有關古文經學的記載，實為劉歆及其弟子的改竄。第三變是小統大統說，異於二變之論，認為孔子經說有小統、大統之分。今文經學所宗《王制》，不過是孔經的小統說，只講中國治法；古文經學所祖的《周禮》，則是孔經的大統說，以治全球為本。第四變是天學人學說，認為孔經中有天、人兩種制度，小統、大統都是對孔經人學的闡發，而孔經中還有高於人學的天學。「六經」中《春秋》、《周禮》、《尚書》為人學，《樂》、《詩》、《易》為天學。人學為人類社會立法，天學為宇宙立法。第五變是天人大小說，把天學之神遊、形遊與人學之小統、大統加以貫通。這也是對第三、第四變的細化。第六變是以《黃帝內經》五運六氣解《詩》、《易》，相互比附，以證《詩》、《易》天學。廖平經學的六變，較有意義的是第一變區分今、古文經學和第二變尊今抑古，以及講孔經人學與天學。其後三變，附會離奇，多遭學者批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今文經學的流弊。<sup>1</sup>

<sup>1</sup> 參見陳德述、黃開國、蔡方鹿：《廖平學術思想研究》（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

廖平經學對思想史的重要影響主要有兩點：一是認為孔子「微言大義」的真諦是託古改制；二是認為古文經學乃劉歆等所偽造。這兩點見解的政治意義要大於它的學術價值。古文經學在歷史上長期佔統治地位，也是清王朝專制統治的重要理論基礎，一旦被廖平宣佈為偽造，這對打破二千年來無人敢疑、無人敢違的舊傳統，把人們的思想從禁錮中解放出來，具有思想啟蒙的積極作用。廖平根據時代的要求，強調託古改制，因時救弊，是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他說：「《周禮》到晚末，積弊最多。孔子以繼周當改，故寓其事於《王制》。……凡其所改，專為救弊。此今學所以異古之由。」<sup>2</sup>他指出，孔子面對「春秋時禮壞樂崩」的局面，深感不安，「乃思垂教」，「筆削《春秋》」，對《周禮》進行因革損益，以成《王制》，「孔子意在改制救弊」<sup>3</sup>。既然歷史上的聖人孔子都可以對傳統的禮制進行改革，加以「增減」，「孔子繙經，增減制度，變易事實，掩其不善而著其善」<sup>4</sup>，那麼後世的人們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呢？於是廖平把春秋時改周禮之弊與現實的政治改革聯繫起來，相提並論。他說：「春秋時，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弦更張也。」<sup>5</sup>這樣，現實社會改革弊政、「改弦更張」的政治要求就與孔子「改制救弊」的主張相符合。今文經學經過廖平的這樣一改造，孔子就不僅是兩千多年前的孔子，而且亦是近代的孔子了。廖平所提出來的孔子「託古改制」以及「改制救弊」的思想，只不過是借孔子這個歷史權威來表達現實社會的政治主題罷了。

蒙文通在經學研究方面，繼承了廖平以禮制平分今古、尊今抑古的思想，並積極闡發師說，擴大廖平經學的影響。他說：

自井研廖先生據禮數以判今、古學之異同，而二學如冰炭之不可同器，乃大顯白。謂二學之殊，為孔子初年、晚年立說之不同者，此廖師說之最早者也。以為先秦師法與劉歆偽作之異者，廖師說之又一變也。以《大戴》、《管子》之故，而斷為孔子小統與大統之異者，廖師說之三變也。<sup>6</sup>

社，1987年）；黃開國：《廖平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

<sup>2</sup> 《今古學考》卷下，《廖平學術論著選集》（一）（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頁78。

<sup>3</sup> 同前註，頁75。

<sup>4</sup> 《知聖篇》，《廖平學術論著選集》（一）（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頁182。

<sup>5</sup> 《今古學考》卷下，頁85。

<sup>6</sup> 〈經學抉原·序〉，《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頁46。

蒙文通闡述廖平經學的前三變，認為其經學一變是依據禮數來分判今、古文經學的異同，使得今、古文經學之所以區分的內在根據大白於天下。而其經學二變則是尊今抑古，指出古文與先秦師法有異，係劉歆作偽。而其經學三變是提出小統、大統之說。關於以禮制分判今、古文經學這一師說中的重要創見，蒙文通闡述說：「言漢學而不知今古文之別者，不足以語漢學；言今古文而不知歸本禮制者，不足以語今古文。……井研廖師，長於《春秋》，善說禮制，一屏瑣末之事不屑究，而獨探其大源，確定今古兩學之辨，在乎所主制度之差，以《王制》為綱，而今文各家之說悉有統宗；以《周官》為綱，而古文各家莫不符同。」<sup>7</sup>認為廖平於今、古文經學的諸多分歧中，獨探大源，抓住了今、古二學在禮制上的不同這一基本差異，即今文經學以《王制》為綱，古文經學以《周禮》為綱，並肯定廖平著《今古學考》一書，以禮制區分今、古文經學之論，將其與顧炎武對於古音的研究、閻若璩之於《古文尚書》的考辨並列為「三大發明」，給以很高的評價。他說：「井研廖先生崛起斯時，乃一屏碎末支離之學不屑究，發憤於《春秋》，遂得悟於禮制，《今古學考》成，而昔人說經異同之故紛紜而不決者，至是平分江河，若示諸掌，漢師家法，秩然不紊。蓋其識卓，其斷審，視劉、宋以降，遊談而不知其要者，固偶乎其有辨也。故其書初出，論者比之亭林顧氏之於古音，潛邱閻氏之於《古文尚書》，為三大發明。於是廖氏之學，自為一宗，立異前哲，岸然以獨樹而自雄也。」<sup>8</sup>由此可見蒙文通對其師說的肯定與宣揚。

關於經學史上的今、古文經學之爭，學術界一般認為二學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西漢今文經學專明經書中的微言大義，東漢古文經學則詳對經書文字的訓詁；西漢今文經學重師法，東漢古文經學重家法等。對此，廖平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說：

今、古學之分，師說、訓詁亦其大端。今學有授，故師說詳明。古學出於臆造，故無師說。劉歆好奇字，以識古擅長，於是翻用古字以求新奇。蓋今學力求淺近，如孔安國之「隸古定」、太史公之易經字是也。古學則好易難字以求古，如《周禮》與《儀禮》古文是也。古學無師承，專以難字見長，其書難讀，不得不多用訓詁；本無師說，不得不以說字見長。師說多得本源實義；訓詁則望文生訓，銖稱寸兩，多乖實義。西漢長於

<sup>7</sup> 〈井研廖師與漢代今古文學〉，《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頁120。

<sup>8</sup> 〈經學抉原〉，《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頁101。

師說，東漢專用訓詁。惠、戴以來，多落小學窠臼。<sup>9</sup>

認為之所以「西漢長於師說，東漢專用訓詁」，是因為西漢今文經學「有授」，所以「師說詳明」；而古文經學「出於臆造」，所以「無師說」。與此相關，今文經學力求淺近，以今文隸寫古字；而古文經學則由於無師承，其古文又難讀，不得不多用訓詁，以說字見長，這即是廖平所分析的今文經學重師說，古文經學重訓詁的原因。不特如此，廖平更提出了以禮制區分今、古文經學，這確是他的一大創見。蒙文通繼承廖平，闡發師說，力將此說發揚推廣，擴大其影響。他推闡其師說云：

今古文之爭，起於漢代，亦烈於漢代。清世經學，以漢學為徽幟，搜討師說，尋研家法，遂亦不能不有今古文之辨。……本師井研廖季平先生初治《穀梁》，有見於文句、禮制為治《春秋》兩大綱，後乃知《穀梁》之說與《王制》相通，以為《王制》者孔氏刪經自訂一家之制、一王之法，與曲園俞氏之說出門合轍。然俞氏惟證之《春秋》，廖師則推之一切今文家說而皆准。又推明古文家立說悉用《周官》，《周官》之制，反於《王制》，求之《五經異義》、《白虎通義》而義益顯。又知鄭康成遍注群經，兼取今古，而家法始亂。推闡至是，然後今古立說異同之所在乃以大明。以言兩漢家法，若振裘之挈領，劃若江河，皎若日星。故儀徵劉左庵師稱廖師為「長於《春秋》，善說禮制，洞徹漢師經例，自魏晉以來未之有也。」<sup>10</sup>

指出其師廖平從治《春秋穀梁傳》入手，洞見文句、禮制為治《春秋》的兩大綱，以後又認識到《穀梁》中所言禮制與《王制》相通，故以為《王制》乃孔子刪經損益因革而自訂的一家之制、一王之法，此與清經學家俞樾之說有相合之處，但俞樾之說只取證於《春秋》，而廖氏師說則在一切今文家說中都能得到印證。可見廖平師說更勝人一籌。蒙文通對廖平師說的繼承和闡發，客觀上起到了擴大廖平經學影響的作用。他在繼承闡發廖平師說的過程中，也結合時代的變化，時時提出己見和新意，由此創新、豐富和發展了師說。

在以禮制分今古的基礎上，蒙文通對今文經學作了探討。他說：「蓋西漢初

<sup>9</sup> 《古學考》，《廖平學術論著選集》（一）（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頁138。

<sup>10</sup> 〈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頁104—105。

年只齊、魯之爭，齊、魯合而後《王制》出，有今文。劉歆以來始有今古之爭，而齊、魯之爭息。」<sup>11</sup>認為西漢初年只有齊學、魯學之爭，齊、魯學合後《王制》出，而有了今文學。到劉歆出來以後，才開始有今古文學之爭，這時齊學、魯學之爭息。也就是說，在蒙文通看來，組成今文學的齊、魯之學在西漢初相互爭論，以後合而有今文學的出現，而古文學則是在劉歆時才有，有了古文學，才有了今古文學之間的爭論。

破棄今、古家法，通過剖析今、古文經學家所依據的典籍，上追晚周儒學之旨，是蒙文通超越兩漢，向先秦講論思想的體現。蒙文通之子蒙默先生在談論蒙文通經學第二變時指出：

後又見今、古文所據周秦典籍，各書有各書之面目，各書有各書之旨意，以今、古之學乃漢師就此諸書不合理之強制組合。……今、古之學固已自相矛盾，欲執今、古家法以明周秦之學，殆絕不可能。故主於破棄今、古家法，而「剖析今古家所據之典籍，分別研討，以求其真，則晚周學派之實庶乎可見。」況於漢師所據者外之晚周典籍尚多，更非漢師家法所能概括，更何家法之足守？於是截然將漢代經學與周秦劃分為二。與廖氏六變之皆歸於孔氏者已大不侔，然與廖氏破棄今、古，上追周秦之旨則仍相合。此先君之二說也。<sup>12</sup>

正因為兩漢經學，包括西漢今文經學和東漢古文經學均有毛病，使得儒學之道喪，微言大義絕，儒學衰微，發展停滯，而今、古文學在傳授儒家典籍的過程中，各有其家法，相互之間自有不同。故蒙文通認為，不能以今、古文家法來明周秦之學，先秦典籍之旨也非兩漢經師之家法所能概括，因而他主張破棄兩漢經師的今、古文家法，將漢代經學與周秦儒學劃分開，以周秦為宗，上追晚周儒學之旨。這也是對廖平「舍兩漢而探晚周」的棄兩漢，宗周秦思想的發揮。他說：

文通昔受今文之義於廖師，復受古文學於左庵劉師，摳衣侍席，略聞緒論，稍知漢學大端，及兩師推本齊魯上論周秦之意。自壬子、癸丑迄於癸亥，十年之間，尋繹兩師之論，未得盡通，然廖師之論每以得劉師之

<sup>11</sup> 〈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頁112。

<sup>12</sup> 〈論經學遺稿三篇·後記〉，《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頁154—155。

疏疑釋滯而益顯，中困於匪窟，而作《經學導言》，略陳今古義之未可據，當別求之齊、魯而尋其根，以揚師門之意。時左庵師已歸道山，而廖師猶於病中作書欣許以誨勉之，不以稍異於己說為嫌。旋以尋繹師門五帝堯舜之訓而作《古史甄微》，更為《天問本事》以輔之，乃覺周秦學術諒有三系之殊，復改定《經學導言》舊稿為《經學抉原處違論》，略陳漢師今古學之未諦，以思究宣師門棄兩漢、宗周秦之微旨，師皆見之也。及再繹五運之訓，而略見周秦之學複如彼其曲折，按古官之沿革，而又確知今古家各據《王制》、《周官》以為宗者為可議。今古學之綱宗本可疑，故依以成之今古學，持之以衡兩漢固若綱之在綱，無往而不協；若持之以通周秦，則若鑿之於枘無往而有當，無怪其然也。廖師之揭齊魯以易今古之學而召後進，其義固確然不可易，而以五帝五運之說命文通，其訓亦深微也。文通既鑽研師門之義，由禮數之故以求兩漢之學、今古之事殆十年，始於《公》、《穀》之異同見《王制》為雜取齊、魯之書。《王制》之為齊、魯糅合而成，亦猶鄭康成之糅合今古兩學，於是舍今古之異同而上求之齊、魯。於是略窺師門舍兩漢而探晚周之意。<sup>13</sup>

蒙文通分別受學於廖平和劉師培，得今、古兩家之義。廖、劉二人都有「推本齊魯上論周秦」之意，這對蒙文通思想產生影響。後蒙文通進一步尋繹探討兩師之論，求之於齊、魯之學而尋其根源。此時蒙文通已與廖平師說有異，在研究過程中他認為今、古家各據《王制》、《周官》以為宗之說有可議之處。即拿它來衡量兩漢今、古文學則可，但如果以此說來通周秦，則「若鑿之於枘無往而有當」，指出即使《王制》篇也是糅合齊、魯而成，猶如鄭玄之糅合今、古兩學。於是蒙文通舍今古之異同而上求之齊、魯，將師門「舍兩漢而探晚周之意」作了進一步發揮。

蒙文通還批評今、古文經學乃漢人不合理強制組成之學，不能持之以上概先秦之學。

他說：「苟知今古學實為漢人不合理強制組成之學，而剖析今古家所據之典籍，分別研討，以求其真，則漢人今古學之樊籬立即動搖，徒究心於今古已成之後，而不思求於今古未建之前，……徒爭今古學，而不知今古之自身本即是

<sup>13</sup> 〈井研廖師與漢代今古文學〉，《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頁135。

不一致之學，即學術中絕無所謂今古學，尤不能持之以上概先秦。」<sup>14</sup>即今、古文學乃漢人之學，各有其所依據的典籍，通過研討，可知其來歷，但不能以漢人不合理的強制之學為依據，來上概先秦儒學。蒙文通破棄今、古家法，通過剖析今、古文經學家所依據的典籍，上追晚周儒學之旨，是他超越兩漢，向先秦講論思想的體現，亦是他受廖平影響而對其思想的發揮。

## 廖平、蒙文通經學思想之差異

除繼承廖平師說外，蒙文通思想中也有與廖平明顯不同之處，如他不贊成廖平所說的古文經學本於劉歆作偽的說法；廖平批評廢經革命說，蒙文通則批《公羊》學之改制說而主今文經學的革命說等。

### （一）關於古文經學是否作偽問題

蒙文通不同意廖平關於古文經學乃劉歆偽造之觀點，他認為古文經決不會盡是劉歆偽造的。一定程度上肯定古文經學的歷史地位，認為從史學言之，古文學倒無大錯，其特點是專心致志從事於經文的訓詁考證，用力至誠，腳踏實地，嚴謹固守，而敦於篤行，這是其長處。當然他也批評了古文學的弊端。

廖平認為古文經學本於劉歆作偽，指出東漢初以前十四博士皆為今學，同祖《王制》，道一風同，並無古文經學可言；而古文經學所宗的《周禮》專條，全出劉歆之偽。劉歆作偽的目的，在學術上是為了報復經學博士，在政治上則是為迎合王莽篡漢。<sup>15</sup>康有為亦以為古文經學的典籍《周禮》、《古文尚書》、《毛詩》、《左傳》等均是劉歆作偽的偽經，劉歆作偽是為了用經義助王莽新朝篡漢，故將自己批評劉歆的著作名為《新學偽經考》。該書不守經師家法，而以考證、辨偽見長，其見解主要包括：一是認為所有古文經典，甚至古文本身，皆屬偽作；二是認為無論古經、古字之偽，皆出於劉歆一人；三是認為劉歆偽學，首推《周官》，蓋以「欲附成莽業而為此書」，「其偽群經，乃以證《周官》者」；四是認為劉歆偽作群經，《左傳》開其先河，繼之以《樂經》、《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費氏易》與《論語》、《孝經》為最晚出，又以古經出於古文，自必先偽造古文。以為古文經學的典籍《周禮》、《古文尚書》、《毛詩》、《左傳》等均是劉歆作偽的偽經，劉歆作偽是為了用經義助王莽新朝篡漢，古文經，

<sup>14</sup> 〈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頁114。

<sup>15</sup> 參見黃開國：《廖平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頁118—119。



則是劉歆為「佐莽篡漢」而作的「偽經」。<sup>16</sup>

蒙文通對其師廖平及康有為等關於古文經學本於劉歆作偽的觀點持有不同意見，他認為古文經決不會盡是劉歆偽造的。他說：

近代的今文家都說古文是劉歆偽造的，何至如此！不過古文到了劉歆，他想把古文振興起來，他借著王莽的勢力，把古文經傳通通立在博士，徵聘天下通知佚經古記的人，前後數千，讓他們都住中央廷中去討論，《莽傳》說他「將令正乖謬、壹異同」。是王莽也照石渠的辦法做過。他的結果，後人無從知，大概是古文家佔勝利。古文與王莽、劉歆的關係不過是如此，決不會儘是劉歆偽造的。這一大部分書，從漢武帝起，已經在經師間討論了，但是當時何以會完全排斥不用，其中也自有個原故。凡是《周官》、《左傳》、《毛詩》、《古文尚書》這部分書，都在河間獻王那裏。……《逸書》、《逸禮》、《周官》、《左氏》、《雅樂》等，獻王一齊都向武帝進獻去，武帝把這幾種書訾議了一陣子，便一齊藏之內府，不要人講。劉歆說《逸禮》、《逸書》、《左傳》「皆藏於秘府，伏而未發。」馬融說《周官》「伏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禮樂志》說《雅樂》「天子下大樂，惟以備數。」<sup>17</sup>

可見在古文經是否為偽的問題上，蒙文通與其師說存在著不同的見解。他不同意廖平、康有為等近代今文家關於古文經是劉歆為了迎合王莽篡漢，「飾經佐篡」而偽造的觀點，認為古文與王莽、劉歆的關係不過是劉歆為了把古文振興起來，借助王莽的勢力把古文經傳立在博士，並前後徵聘了數千知曉逸經古記的人，集中起來討論，亦依照石渠閣會議的作法來「正乖謬、壹異同」，其結果「大概是古文家佔勝利」，所以古文經決不會盡是劉歆偽造的。即古文經基本上不是偽造的。他認為這部分古文經書，從武帝起就已經在經師中討論了，河間獻王曾把所收藏的《逸書》、《逸禮》、《周官》、《左氏》、《雅樂》等古文經書進獻給武帝，只不過武帝不喜歡這些書，將其一齊藏於內府，不要人講，所以諸儒莫得其知。蒙文通並分析了古文經書之所以藏之秘府，而遭排斥的原因。他說：

河間獻王獻上的書，武帝一概排斥，究竟是為什麼呢？看杜業說，武帝

<sup>16</sup> 參見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

<sup>17</sup> 〈經學導言〉，《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頁15—16。

見河間獻王很有學問，應對如流，他說了句「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獻王回去，就不再講學，不久就死了。可見武帝因為忌刻獻王，才一併排斥這一部分書。古文一部分書，都是受了河間獻王的影響。古文學的內容，本來是熔合許多不相同的成分來冶為一爐的，其中有些是古史，有些是孔壁的逸經，有些是散在民間的經傳，獻王把他們一齊集合在河間來，後因武帝忌刻獻王，他們同遭排斥，一同失敗，於是結合起來自成一派，和博士反抗，這便是他們結合的緣起，是和今文學的結合是一樣的。……古學的結合，當然是起自獻王，新莽不過隨著他走罷了。<sup>18</sup>

指出武帝忌刻獻王，是古文經書遭排斥的原因，也是古文學被排斥的原因。認為古文學的內容是熔鑄多種不同的成分於一爐，是在獻王時由古史、孔壁的逸經、散在民間的經傳結合而成。因為獻王把組成古文學的內容一齊集合到河間來，後獻王遭武帝排斥，獻王收集的古文經書也遭排斥，一同失敗。但古文派並沒有消失，而是結合起來自成一派，同博士反抗，蒙文通認為，這即是古文學結合的緣起。他強調，古學的結合，當然是起自獻王。其目的在於認定古文學在獻王時已有，其經書在獻王時已獻給武帝，所以不能說古文學是到了劉歆、新莽時才有，而其古文經典是由劉歆所偽造的。以此否定近代今文家關於古文經是為了迎合王莽篡漢、由劉歆所偽造的觀點。在這裏，蒙文通關於古學派結合起來，與博士反抗，即古學的結合，起自獻王的觀點，與他本人後來所言古學由劉歆所創立的觀點多少有些出入。在《經學抉原》寫作時，蒙文通說：「劉歆之創立古學，發端於《左氏》，歸重於《周官》。方其初起，尚近今文，後乃益去而益遠。」<sup>19</sup>認為古學乃劉歆所創立，這與他在《經學導言》所講的有所不同。或者說，古學在獻王時已開始結合、逐步形成，到劉歆時則正式創立。

雖然蒙文通肯定劉歆創立古文學的貢獻，但對劉歆所言古文經典出自於孔壁，由孔安國獻於朝廷，藏於秘府的說法卻持不同意見。他認為這種說法是劉歆挾古文以自重。他說：

至孔壁得《逸書》十六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兒寬受學於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出於寬，則壁中《尚書》、《禮經》，古文家見之，

<sup>18</sup> 同前註，頁 16。

<sup>19</sup> 〈經學抉原〉，《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頁 78。

今文家固亦見之也。劉歆必曰：「天漢之後，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藏於秘府，伏而未發。」然《史記》終於太初元年，而《儒林傳》已言「安國至臨淮太守，早卒。」是安國已卒於太初之前，烏得天漢之後，巫蠱禍起，而安國尚於時獻書，此劉歆曲為博士不見壁書全經之說，而挾古文以自重也。<sup>20</sup>

即是說孔子十一世孫孔安國得到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時在孔子住宅壁中發現所藏的《逸書》十六篇等古文經書，以今文讀之。兒寬曾受學於孔安國，其後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尚書》學皆出於兒寬。如此，蒙文通認為壁中經書，古文家和今文家均見之。但認為劉歆所說的武帝天漢之後，孔安國將壁中書獻給朝廷，遇巫蠱之難，未及施行，將其藏於秘府的說法卻不可信。這是因為，《史記》所記，終於太初元年，而孔安國在太初之前已卒，不可能在天漢之後的巫蠱禍起之時，已去世的孔安國尚能獻書。蒙文通認為，這是劉歆以博士未見壁中書全經之說，而挾古文經書以自重而已。然魯恭王得孔壁古文的記載見於《漢書》，而不見於《史記》本傳，故引起後來學者的懷疑。即壁中書和劉歆所說孔安國將其獻給朝廷之說，均有所疑。對此，蒙文通說：「古文之學，以有壁中逸經而興，然古學者乃不傳逸經，古學之大異於今學者，為獨宗《周官》、《左氏》，而《周官》、《左氏》固自不出於壁中，孔壁逸經果有足為古學之根據者，古文家寧不傳之。則知孔壁古文，實非賈、鄭古學家之所本，漢魏之交，其籍猶存，而劉歆以後之古學，其所據以立義者，固在彼不在此也。」<sup>21</sup>雖然蒙文通稱，古文之學以有壁中逸經而興，但他對孔壁古文逸經不甚看重，原因在於逸經並未被古文學者所傳，而古文學大異於今文學的地方，正是在於其獨宗《周官》和《左氏傳》，然而這兩部書卻不出於壁中。壁中古文據《漢書·藝文志》所言，有《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數十篇。如果說孔壁逸經真有足以為古學之根據的經書，古文家難道不傳它嗎？既然孔壁中沒有最具古文學學派特色的《周官》和《左氏傳》兩書，那麼就可知孔壁古文實非賈、鄭等古學家之所本，雖然在漢魏之交，其壁中古文猶存，但劉歆以後的古文經學，其所據以立義的經書，自然不是壁中古文逸經，而是《周官》、《左氏傳》等其他經書了。結合上面蒙文通所說的河間獻王搜集古史、孔壁逸經、散在民間的經傳，並把所收藏的《逸書》、《逸禮》、《周官》、《左氏》、《雅樂》等古文經書進獻給

<sup>20</sup> 〈經學抉原〉，《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頁70—71。

<sup>21</sup> 同前註，頁72。

武帝，武帝將其藏於內府。河間獻王所收藏的古文經書倒是包括了古文學所獨宗的經典《周官》和《左氏》，這倒可以彌補壁中古文逸經之不足。

除肯定古文經學為兩漢經學之一脈，反對將古文經說成是偽造的外，蒙文通也對古文經學的流弊提出了批評。認為從史學言之，古文學倒無大錯，但如果站在儒學發展的角度看，則古文經學立而儒道衰。他說：

井研廖師以今文為哲學，古文為史學，誠為不易之論。若以史言，則賈、馬之儔固無大失；若以儒言，則今文已遠於孟、荀之緒，又況古文之學哉！自今文之學起而儒以微，至古文之學立而儒以喪。考之先秦學術之變，而知儒之日益精卓者，以其善取於諸子百家之言而大義以恢宏也；儒之日益僿陋者，以其不善取於舊法世傳之史而以章句訓詁蔽之也。自孔、孟以下，儒者也；今文章句之學，則經生也；古文訓詁之事，則史學也；三變而儒道喪、微言絕、大義乖，皆漢師之罪也。<sup>22</sup>

指出其師廖平的「以今文為哲學，古文為史學」的見解乃為不易之論，如果以史學的角度看，賈逵、馬融等古文經師亦無大的過失；然以儒學發展的眼光看，則今文經學已遠離了先秦孟、荀之學的端緒，又何況古文經學呢！由此，蒙文通直把儒學微喪的原因歸罪於漢代經學，認為西漢今文經學起，使得儒學衰微；至東漢古文經學立，更使儒道喪。在蒙文通看來，先秦孔孟之學，乃是儒學；而今文章句之學，則為經生之術；至於古文訓詁之事，只能算史學。如此「破碎大道，孟、荀以來之緒殆幾乎息矣。……自儒學漸變而為經學，洙泗之業，由發展變而為停滯」<sup>23</sup>。為了糾正漢學這種儒道喪、微言絕、大義乖的流弊，蒙文通主張超越兩漢，上溯周秦以廣其學，而不能以章句經訓自限。

在對漢學流弊的批評中，蒙文通既指出先秦儒學與漢代經生之學的差異，更於兩漢經學中，集中批評了東漢古文經學，正因為古文經學惟以訓詁考證為學，才使得孔氏儒學晦而不明。他說：「晚周之儒學，入秦漢為經生，道相承而跡不相接。孟、荀之術若與伏生、申公之業迥殊。……而古文家因之以興，刊落精要，反於索賔，惟以訓詁考證為學，然後孔氏之學於以大晦。道之敝，東京以來之過也，賈、馬、二鄭之儔之責也。」<sup>24</sup>認為學晦、道敝是東漢古文經學的過

<sup>22</sup> 〈論經學遺稿三篇·甲篇〉，《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頁147。

<sup>23</sup> 同前註，頁146。

<sup>24</sup> 〈論經學遺稿三篇·乙篇〉，《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頁148—149。

錯，亦是賈逵、馬融、鄭興、鄭眾等古文經學家的責任。

在對古文經學的批評中，蒙文通還揭示了古文學的特點是敦於篤行，而疏於思究，缺乏理想。他說：「古文之學，緣隙奮興。舍傳記之博、師說之奧，專事經文，視如舊法世傳之史。刊落精要，反於惛幅，徒以考證訓詁為學。復以《周官》之儔，舊法之史為主，而義以特異。然後儒者之學，於是再變，而道以大晦。故東京之學，不為宏言卓論，謹固之風足尚，而恢宏之致頓消。士敦於篤行，而暗於思究。」<sup>25</sup>客觀地指出古文經學的長處和短處：專心致志於經文的訓詁考證，用力至誠，腳踏實地，嚴謹固守，而敦於篤行，是其長處；但由此而轉化為以對經書的考證訓詁代替了對儒道的探究，使得「道以大晦」，而暗於思究，這是其短處。並且，古文學缺乏哲學思辨和政治理想。他說：「自古文之學盛而經術晦、哲學絕，亂師儒之微言於姬周之史跡，凡經訓所陳『革政』之義，其為建國宏觀、政治理想，體大而思精者，說且不明，安望見之於行事？」<sup>26</sup>認為古文經學的盛行造成了「經術晦、哲學絕」，以對史跡的考證替代了師儒之微言大義，由此不明於儒學的政治理想和體大思精的道理，由於學說不明，則難以行之於事。這些都是訓詁之學興，使經學失其思想內容，反映了古文經學的流弊。

## （二）關於「改制」說和革命說

廖平、蒙文通經學思想的差異還表現在蒙文通對清代今文《公羊》學及其「改制」說的批評上。與此相關，廖平從尊孔尊經出發，批評革命派的廢經革命說，而蒙文通則主今文經學的革命說。

清中葉後，今文經學復興，一直延續到晚清。今文學者在研治經學的過程中，注意發揮經書中的「微言大義」，予以新解，為變法維新提供理論依據，他們議論世事，干預時政，宣傳變易改制，在當時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

清代今文經學主要是復興西漢今文經學，而超越東漢古文經學，其經典的依據主要是《春秋公羊傳》，通過《公羊春秋》發明經義，所以亦稱「公羊學派」。其創始人莊存與、劉逢祿是常州人，其弟子也多為常州人，又稱其為「常州學派」。

清代今文經學繼乾嘉漢學而起，並對乾嘉漢學汲汲於文字訓詁，名物考證，

<sup>25</sup> 〈儒學五論題辭〉，《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學甄微》（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頁240。

<sup>26</sup> 〈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學甄微》，頁194—195。

而脫離實際，少有闡發新義的學風加以修正，側重於研究和發揮今文經傳的「微言大義」，具有通經致用的特點。清代今文經學的代表人物早期有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等，中期有龔自珍、魏源等，晚期有廖平、康有為等。他們的學術活動和學術思想不僅是清代新漢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中國經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蒙文通對清代今文學的研究，把清代今文經學分為兩派，其中繼承西漢今文經學，講《公羊》學的一派遭到蒙文通較多的批評，而廖平以禮制分今古的一派則為蒙文通所認同。他一方面繼承其師廖平的今文思想，另一方面又批評《春秋》公羊學，甚至將其視為偽今文學，予以否定，批評清代今文學之「改制」說，認為其未能領會「革命」之旨，徒言改制。但他認同的廖平今文學也是講改制，以致康有為亦受到廖平此說的影響，而著《孔子改制考》，宣傳變法維新。就此而言，研究經學不能脫離當時的時代背景，無論是漢代還是清代，都有革命說不宜在任何時間、任何背景下全然推行的客觀情況。也有改制說在一定時代背景下提出和適宜推行的理由。以及隨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思想學說也隨之而變，不能套用革命說適合於任何時代和地點，也不能說改制說在任何情況下皆一定錯誤。蒙文通對革命說的認同，對《公羊》學及改制說的否定，是他評價從漢代到清代今文學的一個重要標準，從中亦可見蒙文通經學今文經學觀的一個特點。

對清代今文學，蒙文通將其分為不成熟之今文學（包括偽今文學）和成熟之今文學兩派。不成熟之今文學包括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魏源，以及受龔、魏影響的康有為等人之今文學，而其中龔、魏之學甚至被蒙文通視為偽今文學。成熟之今文學即以其師廖平為代表，廖平也受到其師王闡運，及為蒙文通所稱道的陳壽祺、陳喬樞父子等人的影響。通過探討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及其發展演變，蒙文通闡述了自己的清代今文經學觀。他說：

孔廣森之治《公羊春秋》，為二千年來不傳之絕學，蓋各家之師法，至是而略明。然治《公羊》者亦治《周官》，治虞《易》者亦治《左氏》，莊存與、惠棟之流皆是。……劉、宋不足以言成熟之今文學，然其區分今古，對壘抗行，自此之後遂有整個之今文學，功實不可沒。……廖師推本清代經術，常稱二陳著論，漸別古今。廖師之今文學固出自王湘綺之門，然實接近二陳一派之今文學，實綜合群言而建其樞極也。他若魏源、龔自珍之流，亦以今文之學自詡，然《詩·書古微》之作，固不必求之

師說，究其家法，漢宋雜陳，又出以新奇臆說，徒以攻鄭為事，究不知鄭氏之學已今古並取，異鄭不必即為今文。……故龔、魏之學別為一派，別為偽今文學，去道已遠。激其流者，皆依傍自附者之所為，固無齒於今古文之事。故有見一隅而不窺全體之今文學，有知其大概而不得其重心之今文學，此皆未成熟之今文學，而又別有魏、龔一派漫無根莖之今文學；是漢代之今文學惟一，今世之今文學有二。至廖師而後今文之說乃大明，道以漸推而漸備，故廖師恒言：踵事增華，後來居上，然不有莊、張、劉、宋、二陳之啟辟途徑於前，雖廖師亦未易及此。而龔、魏以狂惑之說亂於前，揚其波者又淆之於後，致求今文者亦非，擊今文者亦非，能遠紹二陳、近取廖師以治今文者，近世經師惟皮鹿門一人而已。

27

認為清中葉孔廣森治《春秋公羊傳》，使得兩千年不傳之絕學而略明。但清中葉今文經學初興之時，並不排斥古文學，所以當時還難分今古文學，如莊存與等既治今文《公羊》，又治古文《周官》。至劉逢祿、宋翔鳳，雖然他們的學問是不成熟的今文學，但其區分今古，使今古文學對壘抗行，自此而後有了整個今文學，功實不可沒。尤其是劉逢祿，他主西漢董仲舒、東漢何休之學說，確守今文師法，反對東漢許慎、鄭玄的瑣屑考證，主張發揮「微言大義」，通過研究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詁》，從闡發何休的「三科九旨」入手，對「張三世」（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通三統」（夏、商、周）等《春秋》義例作了系統闡釋，主張發揮「張三世」的改制思想。為清代《春秋》「公羊學」的復興奠定了基礎，由此形成《春秋》「公羊學派」，並對近代改良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但蒙文通卻認為劉、宋之學乃不足以成熟的今文學言之，只不過在區分今古文學上，有它的功勞。而廖平以王闢運為師，在陳壽祺、陳喬樞父子「漸別今古」及陳立「知禮制為要」<sup>28</sup>思想的影響下，「綜合群言而建其樞極」，提出以《王制》、《周禮》區分今古文學的思想。在蒙文通看來，廖平一派才是成熟之今文學，所以說「漢代之今文學惟一，今世之今文學有二。至廖師而後今文之說乃大明」。而「龔、魏之學別為一派，別為偽今文學」。把與己說有異，注重發揮《公羊傳》的「公羊三世說」，主張「更法改圖」，改革弊政，以及繼承董仲舒的《公羊春秋》說，發揮《公羊》的「微言大義」，使經術為治術服務的龔自珍、魏源之今

<sup>27</sup> 〈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頁104—105。

<sup>28</sup> 同前註，頁105。

文學說成是「偽今文學」。認為龔、魏一派「去道已遠」，「漫無根荄」，是以「狂惑之說亂於前，揚其波者又淆之於後」。對龔、魏今文學本身及其產生的影響予以否定，這包括「以龔、魏為依歸」<sup>29</sup>的康有為之今文學。這反映了蒙文通的清代今文經學觀。

進而，蒙文通批評清世今文學者皆主於《公羊》，是以支庶而繼大統。認為若按以禮說經，則《穀梁》魯學為大宗，魯學應為經學之嫡傳。並認為《公羊》學的改制說也非經學之本義，乃不根之說。對組成清代今文學重要內涵的《公羊》學及其改制說加以否定，而即使其師廖平也主張孔子改制說，認為孔子改制，其意在救弊，但這也在蒙文通的否定之例。他說：

清世言今學者皆主於《公羊》，遂以支庶而繼大統，若言學脈，則固不如此。由《穀梁》以禮說今文者，魯學之遺規，由《公羊》以緯說群經者，齊學之成法，此今文中二派對峙之主幹。經學者固魯人為嫡傳，緯書者固齊學之大本，齊學且不必專言經，治經者其餘事耳。自經學既盛，齊人亦起而說六典，遂以陰陽五行之論入之，其學自不必以經為主。況以何休之義言之，改制之說推本於王魯，王魯之說推本於隱公元年，以為諸侯不得有元年，魯隱之有元年，實孔子王魯之義，亦即改制之本。然《左氏》稱惠之二十四年，惠之十八年，《晉語》自以獻公以下紀年，諸侯之得改元，《春秋》著其實。《白虎通義·爵篇》謂：「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則禮家斷其義。安在隱公元年即是王魯，而衍其說於改制？故改制者實不根之說，非經學之本義也。……由改制故言託古，改制之事不實，則託古之說難言。<sup>30</sup>

認為今文學中有齊魯兩派的對峙：由《穀梁》以禮說今文，此為魯學之遺規；由《公羊》以緯說群經，此為齊學的成法。而蒙文通以《穀梁》魯學為大宗，魯人為經學之嫡傳；而以《公羊》齊學為巨擘，齊學以緯書為大本。儘管清代今文學者皆主於《公羊》之齊學，但蒙文通認為這不過是支庶佔據了大統的地位，分枝之巨擘取代了嫡傳之正統地位。類似於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所說的「別子為宗」。雖然蒙文通在這裏主張以《穀梁》魯學為大宗，為經學之正統嫡傳，而以《公羊》齊學為支庶，齊學本之於緯書，重魯學而斥齊學，

<sup>29</sup> 同前註，頁 108。

<sup>30</sup> 〈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頁 106—107。



但在他本人所作的代表著作《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裏，卻又盛讚作為齊學的《齊詩》學，並引緯書以證《齊詩》之「五際」、「四始」說，認為今文學的「革命」說的理論依據在西漢今文《齊詩》學的「五際」說中就可找到。以《齊詩》「五際」說之「革命」說來批評晚清《公羊》學派宣傳的「改制」說，這恐怕有些自相矛盾。如果說，蒙文通要批判齊學及其所依據的緯書，藉以樹立魯學作為經學的正統嫡傳地位，那麼，就不應盛讚作為齊學重要組成部分的以緯書為依據的《齊詩》學之「五際」說。既批判齊學之《公羊》學，又盛讚齊學之《齊詩》學，對緯書並不排斥，而有所引用，恐前後難以自圓其說。

蒙文通並對清代《公羊》學為批判沒落的封建君主專制主義，要求改革，實行君主立憲制而提出的理論基礎——「改制」說加以否定。認為按何休所說，改制之說推本於王魯，王魯之說推本於隱公元年，以為諸侯不得有元年，魯隱公之有元年，表明孔子王魯之義，亦即是改制之本。但依《左傳》、《國語》之《晉語》都有諸侯改元的記載，並引《白虎通義·爵篇》之語，既有王者改元，也有諸侯改元，所以不能說記載了魯隱公元年，就表明了孔子王魯之義，而王魯就成了改制的依據。蒙文通認為，建立在魯隱公元年、王魯基礎上的改制之說是沒有根據的「不根之說」，亦非經學之本義。其說或有一定的道理，而何休及運用改制說的廖平、康有為或許有解說不清的地方，但包括清代今文學及其改制說在內的任何思想文化既然是時代的產物，就應適應時代變遷和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需要，而不是讓社會的發展去適應某種在歷史上產生的思想文化。也就是說，歷史研究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探討和總結歷史上思想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發展線索、歷史經驗教訓及對後世和現代社會的影響，為現代社會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因此，對清代今文學包括《公羊》學及其「改制」說的研究，應把歷史的觀點與現實的觀點結合起來，即把歷史上的經學考證與現實社會發展變革的實際需要結合起來，以探討今文經學與清代社會發展的關係。主要看今文學及其「改制」說有沒有提供當時社會變革所需要的進步的思想理論，是否為社會進步、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對今文經學及其影響作現代審視、反思，挖掘其現代意義。應客觀歷史地看到，廖平、康有為根據時代的要求，強調託古改制，因時救弊，是具有其重要政治意義的。廖平認為《周禮》到晚末積弊最多，孔子以繼周當改，故寓其事於《王制》。凡其所改，專為救弊。這是今文學之所以與古文學不同的原因。他指出，孔子面對春秋時禮壞樂崩的局面，深感不安，乃思垂教，筆削《春秋》，對《周禮》進行因革損益，以成《王制》，孔子其意在改制救弊。受廖平思想的影響，康有為著《孔子

改制考》，大力宣傳「託古改制」思想，把「託古改制」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為變法維新運動提供理論依據。康有為將「公羊學」的三世說與《禮運》的小康、大同說相結合，認為由據亂世進入升平世（小康），進而發展為太平世（大同）是社會進化的普遍規律。他認為當前中國仍處於據亂世，應當改革為君主立憲制，而以後再實行民主共和制。康有為以「託古改制」說為依據，大力提倡進步的民主和民權平等思想，宣傳歷史進化論和社會進步論，批判沒落的封建君主專制主義，要求改革，實行君主立憲制，這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時代精神，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因而其孔子「託古改制」說也遭到了封建頑固派的攻擊。到後來，隨著時代的進一步發展，康有為領導的變法維新運動及其「託古改制」理論漸趨落後，已不適應新時代發展的要求，而被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及其革命理論所取代。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廖平、康有為所提倡的今文經學理論的進步性及其為社會發展所做出的貢獻。

與廖平提出的孔子「託古改制」及「改制救弊」說相比，康有為的孔子「託古改制」的思想更具時代性和政治性。如果說，廖平的孔子「託古改制」說主要從歷史上的今文經學的《春秋》「公羊學」出發，來闡述孔子「微言大義」的真諦是託古改制，較少聯繫現實政治，也少有論述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政治理論的話，那麼，康有為則著眼於現實政治改革的需要，通過「古為今用」的手法，把孔子塑造為其「聖意」在「改制」的現代維新主義者，康有為這樣做的目的在於證明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變法思想是合乎古訓、與聖人孔子的改制主張相符合的，如此可以減輕傳統的壓力，以保護自己的變法改制主張。不難看出，康有為的思想更具時代特色和現實政治意義，是通古經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典型。而廖平則少有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意識和民權平等思想，只是一般的主張改文從質，學習西方。其學習西方主要是學習西方的經濟、工程技術和管理方法，少有學習西政。雖然康有為的變法改制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到後來他的思想漸趨保守，但康有為講的孔子託古改制，是帶一種政治革命、社會改造的意味。這也體現了與廖平思想的區別，儘管他曾吸取借鑒過廖平的《公羊》學思想，但廖平的思想主要不是講政治革命、社會改造，而是依據《公羊》學的素王改制說，講尊孔尊經，這與康有為借孔子改制說之名，行資產階級維新變法之實的主張有所不同，這也是康有為之思想淵源頗出自井研廖平，其思想影響又遠大於廖平的原因。蒙文通對廖平與康有為兩人的關係作了一定的論述，認為雙方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係。他說：

（廖平）及既與南海康有為見於廣州，康氏遂本廖師之《今古學考》、《古學考》以作《新學偽經考》，本其《知聖篇》以作《孔子改制考》，康氏之學實以龔、魏為依歸，而未窮廖師之抵蘊。梁啟超謂康氏之學非自廖氏，而盛推龔、魏以及於南海，是為實錄，知師固莫如弟子。惟《偽經》、《改制》兩考，不能謂非受影響於廖師，特自有廖氏學，不得以康氏之言概廖氏學耳。廖師聞康氏以《左氏》、《周官》諸古經皆劉歆所偽作，信而用之，遂有《周禮刪劉》，此當廖氏學之一變，是為康氏之學影響於廖氏。然劉歆胡能悉偽諸經，又胡為必悉偽諸經？<sup>31</sup>

指出康有為於廖、康廣州之會後，依據廖平所著《今古學考》和《古學考》以作《新學偽經考》，依據廖平所著《知聖篇》以作《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書均為康有為的代表著作，通過兩書，康有為宣傳「託古改制」思想，為變法維新運動製造輿論。並把《公羊傳》的「三世」之說與《禮運》的「大同」思想結合起來，作為變法維新的理論根據。這也表現出康有為受到了廖平思想的影響並加以發展。雖然這裏說梁啟超稱康氏之學非自廖氏，而盛推龔、魏對康有為的影響。然梁啟超也曾明確承認康有為受廖平影響這一事實。<sup>32</sup>除肯定康有為受廖平思想的影響外，蒙文通也指出廖平也曾受到康有為思想的影響。這主要指廖平聞康有為以《左傳》、《周官》等古文經典皆出自於劉歆作偽，而採納其說，於是作為《周禮刪劉》一文。其實廖平在其著作《辟劉篇》及由《辟劉篇》修訂而成的《古學考》裏，就已提出古文經學本於劉歆作偽這一思想，這是其經學第二變尊今抑古說的重要內容。後來這一思想通過《古學考》影響到康有為，於是康有為作《新學偽經考》。可見是廖平影響康有為在先，而不是康有為先影響了廖平。由於蒙文通對古文經出自劉歆偽作這一師說並未認同，或將其說成是康有為的思想，而影響了其師廖平，以便於駁斥。他說：

今劉歆胡為而作偽，又胡能一人而悉偽群經！古文之起在先，古學之成在後，則先有偽書而後有偽學，本末倒置。劉歆實為作偽而作偽，又能一手作偽而掩盡天下之目，此皆事之不可能者。……有一家之學，然後

<sup>31</sup> 〈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經史抉原》，頁108。

<sup>32</sup> 參見黃開國：《廖平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頁241。

有一家偽作之書，後則徒激辨偽之流，而不知求學派所據，則康氏流毒所被，又康氏所不及料也。故偽經之說，世之明者，自莫之信。廖師於此久而不自安，後由《大戴》、《管子》上證《周官》之非誣，則又易而為大統、小統之說，以今文為小統，孔子所以治中國方三千里之學也，以古文為大統，孔子所以理世界方三萬里之學也。由《小戴》言小統，由《大戴》言大統，小統主《春秋》，大統主《尚書》、《周禮》，推而致之，文字孔作也，《詩》、《易》以治六合也，其道益以幽妙難知。既收《周禮》為孔書，則亦不廢《左氏》，《公羊》之外，兼治丘明。故廖師之學，《春秋》其大宗，禮制其骨幹，及學益宏遠，世之譏笑亦因之。<sup>33</sup>

蒙文通對劉歆作偽說提出疑問：為何劉歆要作偽，劉歆一人又如何能偽造群經？他認為，有了一家的學問，然後才有一家的偽作之書，說偽造的古文經在先，而古文學成於後，先有偽書而後有偽學，這是本末倒置。到後來，辨偽之風流行，而不知探求學派所依據的理據，致使康有為所言劉歆造偽經之說的流毒盛行，為康氏始料不及。然而對於劉歆造偽之說，明白的人，自然不信。把批評劉歆造偽說的矛頭主要指向了康有為，而不是始作俑者的廖平。並認為廖平對於劉歆造偽說，到後來一直不自安，作了某種修正，以證《周禮》之非誣。並提出大統小統說，認為孔子經說有小統、大統之分。今文經學所宗《王制》，不過是孔經的小統說，只講中國治法，是孔子所以治中國方三千里之學；古文經學所祖的《周禮》，則是孔經的大統說，以治全球為本，是孔子所以治世界方三萬里之學。又提出天學人學說，認為孔經中有天、人兩種制度，小統、大統都是對孔經人學的闡發，而孔經中還有高於人學的天學。「六經」中《春秋》、《周禮》、《尚書》為人學，《樂》、《詩》、《易》為天學。把曾被自己否定的偽書《周禮》作為大統人學的典籍，是孔書的一部分，並於《公羊》之外，亦兼治古文學的《左氏傳》，表明廖平斥古文經典為偽書的立場已有變化。之後，廖平的思想又發生了若干變化，世之人也因此而譏笑他。

戊戌變法的失敗，表明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維新理論的局限性。一部分先進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從改良主義陣營中分化出來，走上了共和、民主革命的道路，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派。另一部分保守人士則淪為保皇派，反對革命說。廖平即成為反對「革命」的一員。當時的革命派在戊戌變法後掀起了一股批判封

<sup>33</sup> 〈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頁 109。

建君權、批判三綱五常的思想浪潮。那時，以宣傳革命、批判專制為宗旨的報刊相繼問世，其中包括《民報》、《新中國》、《浙江潮》等。廖平站在保守的立場上，通過對《公羊》的研究，提出反對革命的主張。他驚呼：「講革命，廢三綱，用夷變夏，其風甚熾。」<sup>34</sup>為了反對革命，廖平把批評的目標指向《新中國》、《浙江潮》等民主報刊。他說：「近有《新中國》、《浙江潮》等報以為非革命不足以存中國，三綱之說論之詳矣。」<sup>35</sup>為了維護封建帝制，廖平宣揚「非綱常，國無以立」<sup>36</sup>的觀點，反對用民主代替封建帝王的「家天下」的統治。他說：「說者以為大一統必用民主，不能家天下，……說者蓋因桀紂，遂欲廢棄君綱，不知首出庶物，元首萬不可少。」<sup>37</sup>認為封建帝王——元首「萬不可少」，其保皇態度十分鮮明。這時的廖平已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一樣，成為保皇、反對革命的人物。在對《公羊》的研究中，廖平聯繫實際，反對當時的革命運動，如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和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運動，稱義和團是「拳匪」。他說：「拳匪情形本與革命相同，不教而戰，雖不畏死，血流漂杵，究竟何益？」<sup>38</sup>不僅如此，他還批評革命運動是「蹂躪其鄉邦，禍延宗社」。他說：「小則如唐才常，大則如拳匪」，是所謂「二三少年逞其血氣，遂欲流血以成大事。同類相殺，伏屍百萬，蹂躪其鄉邦，禍延宗社」<sup>39</sup>。把暴力革命視為洪水猛獸，反對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統治。表現出廖平在經學研究中對革命所持的批評立場。

針對革命派提出的「六經」在二、三千年前，古不可治今的廢經言論，廖平認為孔學「六經」「則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萬古不失，與地球相始終」<sup>40</sup>。只要按照孔學「六經」之道辦事，則天下無不大治。當時革命派為了剷除封建主義，宣傳以新的思想代替過時的孔學「六經」，「廢經之說遂遍中土」<sup>41</sup>。廖平起而反對，他認為孔學「六經」萬不可廢，如果廢經，不但中國無法治理，而且將來大一統的世界政治也無所憑藉。他說：「廢經以後中土何所依歸？將來大

<sup>34</sup> 廖平：《公羊補證》卷9，六譯館叢書本。

<sup>35</sup> 廖平：《公羊補證》卷8。

<sup>36</sup> 廖平：《公羊補證》卷1。

<sup>37</sup> 廖平：《公羊補證》卷10。

<sup>38</sup> 廖平：《公羊補證》卷8。

<sup>39</sup> 同前註。

<sup>40</sup> 廖平：《公羊補證》卷4。

<sup>41</sup> 廖平：《公羊補證》卷1。

一統，政教何所憑藉？實無術以善其後。」<sup>42</sup>廖平對革命派廢經言論的批評，是與他反對革命的政治立場聯繫在一起的。

在這方面，蒙文通則與其師說明顯不同，而對革命說持讚賞態度。他在對清代今文經學的研究中，是以對《齊詩》「革命」說的認同，和對《公羊》學及「改制」說的否定，來作為他評價從漢代到清代的今文學的一個重要標準。他說：「『革命』之說不著，於是『三世』之說張皇一世，而『五際』之說獨湮沒而無聞。《京易》、《齊詩》，長為世之詬病。」<sup>43</sup>正因為《齊詩》「五際」說中的「革命」之旨不明，使得《公羊》學「張三世」的改制思想盛行一世，而片面以董、何之《公羊》學概括今文之宏義。這在蒙文通看來，是需要糾正的。從中亦可見蒙文通經學的今文經學觀。

在清末民初以來的社會轉型時期，革命說盛極一時，流行於世。受其影響，蒙文通在經學體系內論政治主要表現在他對今文學革命說的探尋闡發、對晚清《公羊》學及所推崇的今文學大家董仲舒的批評等方面，由此可見社會轉型時期政治對經學的影響。雖然蒙文通經學體系內包含著的政治思想存在著一些可議之處和值得商榷的地方，但蒙文通對政治的關注及他的經學思想受到時代政治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

關於儒家及今文經學中的革命思想，蒙文通加以闡發。他認為，清代今文學家如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魏源等人未能明今文經學的革命之旨，獨推崇「三科」、「九旨」之說，而忽視「五際」、「三期」之說，片面以董仲舒、何休之浮文來概括「六藝」之義，孤樹《公羊傳》，而招致非常可怪之譏，表面上是尊今文之說，而實際上違背了今文之旨。於是蒙文通通過考經證史，並引緯書，以探究今文之「絕學」，追尋儒家革命之義。他說：

世之爭今古文學者何紛紛也，蓋古以史質勝，今以理想高，混之不辨，未解今文之所謂也，而漫曰「王魯」、曰「新周」，說益詭而益晦，莊、劉、宋、魏之儔，殆亦有責焉。不慧遍涉《齊詩》、《京易》、伏生之《書》、戴氏之《禮》，而後知「一王大法」者，自有其經緯萬端，在制而不在義，在行事而不在空言。制備也，則「繼周損益」、「素王受命」非復徒言。苟不省禮家之新制已大異周人之舊規，獨張皇於「三科」、「九旨」，而昧

<sup>42</sup> 同前註。

<sup>43</sup> 〈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學甄微》（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頁169。

忽於「五際」、「三期」，抗董、何之浮文，以概六藝之宏義，孤樹《公羊》，欲張赤幟，以召非常可怪之譏，是欲尊之，適以窒之，斯皆不解儒家「革命」之旨，不求歷史蛻變之跡，正厚儒而不以其道者之罪，而豈侮經毀孔者之過哉？爰搜討史證，旁稽諸子，勘比經義，以探絕學。<sup>44</sup>

蒙文通通過考察今文學的典籍《齊詩》、《京易》、伏生之《書》、戴氏之《禮》，知曉了漢代今文學所說的「一王大法」，即認為《春秋》是為新興王者立法，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其「在制而不在義，在行事而不在空言」。而清代今文學家卻不省察其時之禮家新制已不同於周禮，結果導致片面推崇「三科」、「九旨」，而不講「五際」、「三期」說，致使今文經學的革命說不彰，儒道晦而不明。對此，蒙文通考察了西漢今文學的革命說，並上溯其來源及其變遷，以批評晚清今文學家的「改制」說。他說：

《齊詩》言「五際」、言「四始」，以「改制」、「革命」為依歸，而原本於孟、荀，舍是則「王魯」、「素王」之說無所謂。《孟子》書：問湯放桀、武王伐紂，「『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荀子書：「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為嘗有天下之籍則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孟、荀以桀、紂為一夫而湯、武不弑，其言凜凜其嚴而昭昭其晰也。然在漢代，世俗之說未熄，黃生以「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蓋黃生不免世俗之言，而轅生為能守孟、荀之統。轅生傳《齊詩》，其說即本《詩》義也。《齊詩》之義有「五際」：「卯酉之際為改政，午亥之際為革命。……卯，《天保》也；酉，《祁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者，牧野之事也，則轅固生之義，本於是也。許芝言：「周官反政，尸子以為孔子

<sup>44</sup> 同前註，頁165—166。

非之，以為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為兆民也。」京房作《易傳》曰：「凡為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不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知尸子、《京易》亦主「受命」之說。《尸子·貴言》云：「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於天下則行，禁焉則止。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故不得臣也。」此尸子之意合於孟、荀。……千寶傳京氏《易》，而與「三期」、「六情」之說相應，是《齊詩》、《京易》同法。「五際」以「午亥之際為革命」，「四始」以「大明在亥為水始」。……孫盛述《易》，本之千寶，其曰：「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群黎。……若乃淫虐是縱，酷彼群生，則天人殛之，……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義，何者？誠四海之酷仇，而神人之所擯故也」。是《京易》之傳，猶孟、荀、《齊詩》之說也。晚清之學，急於變法，故侈談《春秋》，張「改制」之說，而《公羊》之學，顯於一時。然「改制」之義，才比於「五際」之「革政」，而「五際」「革命」之說，未有益恢宏之者。<sup>45</sup>

西漢今文《齊詩》學以善說陰陽災異、推論時政著稱，其創始人轅固生為齊人，以治《詩》，漢景帝時為博士。轅固生堅持「湯武革命」說，在漢景帝面前與黃老學派的學者黃生辯論湯武革命之是非。黃生認為湯武革桀紂之命，乃弑也。轅固生則認為，桀紂虐亂，失去天下人心，湯武順天應人而誅桀紂，正是受命之舉。而黃生從維護君主的絕對權威出發，強調即使桀紂失道，也不可君臣易位。轅固生反駁說，若按黃生所言，漢高祖劉邦代秦以即天子之位，那也是非法的了。景帝處於兩難境地，贊成哪一方，都比較為難。如反對湯武革命，那漢家的天下就屬逆篡，得之不正；而如果贊成湯武革命，那以後漢家的天下也可以同樣的理由被易姓革命奪去。景帝作為執政者，從維護漢王朝封建統治的根本利益和現實既得利益的考慮出發，還是傾向於反對湯武革命。使得後來的學者都不敢明言湯武受命而誅殺桀紂之事，即對湯武革命不再講了，否則，將遭至禍害。在漢王朝封建專制的威嚴統治下，學者罕言革命，這是受統治者強制的結果，而不能僅將其歸咎於學者。

蒙文通認為，反對湯武革命的黃生不免流於世俗之言，而堅持湯武革命說的轅固生則能守孟、荀之統。即認為孟、荀、《齊詩》、轅固生一脈相承，都與《易

<sup>45</sup> 〈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頁 166—168。



傳》提倡之湯武革命說為同道。轅固生治《齊詩》，今文《齊詩》學有「五際」說，認為卯、酉、午、戌、亥當陰陽終始際會之時，政治上就必然發生大變動。蒙文通引緯書以述《齊詩》之「五際」、「四始」說，其所謂「五際」說出自《春秋緯·演孔圖》之《汎曆樞》，而「四始」說則出自《詩緯·汎曆樞》，其所論都保存在緯書裏。其文如下：

《詩緯·汎曆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曆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sup>46</sup>

蒙文通認為今文《齊詩》學之「五際」、「四始」說，是以革命、「改制」說為依歸，即革命、「改制」說的依據來自於「五際」、「四始」說，但它們卻出自於緯書《詩緯·汎曆樞》以及鄭玄的《六藝論》，而鄭玄的《六藝論》也是引自於緯書《春秋緯·演孔圖》和《汎曆樞》。可見今文《齊詩》學的革命說是建立在引證緯書的基礎上，蒙文通所引也是出自於緯書。<sup>47</sup>儘管如此，蒙文通認為，今文《齊詩》學的革命說也比晚清變法派的「改制」說更高明。他認為，晚清變法派為了急於變法，過分談《春秋》，其《公羊》學以孔子改制說為理論指導，宣傳變法，然而，《公羊》學所宣傳的「改制」之義，僅相當於《齊詩》「五際」說中的較低層次的「革政」（改正），還未能達到「五際」說中的革命之說，即未能恢宏革命之旨。以《齊詩》的「五際」說來批評晚清《公羊》學的「改制」說，認為革命說的理論依據在西漢今文《齊詩》學中，並引緯書作論據。這反映出蒙文通經學思想一定的局限性。

蒙文通在他晚年（1961年發表）所作的《孔子和今文學》裏，對今文學的

<sup>46</sup> 《毛詩正義》卷一之一，〈詩大序疏〉，《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據原世界書局縮印阮元刻本影印本，上冊），頁272。

<sup>47</sup> 參見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蒙文通文集》第一卷，頁201，註7、9所引。

革命說繼續作了闡發。他說：「今文學思想，應當以《齊詩》、《京易》、《公羊春秋》的『革命』、『素王』學說為其中心，禮家制度為其輔翼。『革命』學說，當導源於孟子。」<sup>48</sup>把革命學說作為今文學思想的中心，而導源於孟子。蒙文通指出：「孟荀是先否認桀紂所受的天命，然後提出湯武不弑篡。《易傳》則是承認桀紂所受的天命，但是卻認為這個天命是可以革去的，明確提出了『革命』的概念。這便是現在所用『革命』一辭的語源。很顯然，這種思想是對當時君主專制殘暴的反抗。《易傳》的思想雖和孟、荀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提法上比孟、荀更明確也更尖銳。」<sup>49</sup>對今文學之革命說的來源作了探討，肯定孟、荀及《易傳》的思想。但蒙文通在論述今文學之革命說在漢代的流傳演變時，仍是充分肯定《齊詩》之「四始」、「五際」說，他所藉以作為論據的材料仍是出自於緯書。他說：「轅固所說『湯武受命』的理論正是和『五際』、『革命』的理論是一致的。統治者不准講論湯武受命，就只好透過《大明》之詩披著陰陽五行的外衣來講論了。」<sup>50</sup>對《齊詩》學者通過緯書及所論陰陽五行說，來講「五際」之革命說的原因和外在壓力作了解釋。儘管對蒙文通的思想有可議之處，但他在經學研究中，把經學與政治緊密聯繫起來，以闡發今文《齊詩》、《京易》學之革命說，這體現了蒙文通經學與政治密切聯繫的特點。

蒙文通之所以提倡「革命」說，批評「改制」論，這有其一定的時代背景。他說：「清末康有為等借今文學以言變法，今文學成了君主立憲的工具。孫中山、章太炎主張民主革命，反對君主立憲。章太炎、劉師培對立憲派的根本理論進行批判，指責今文學家講陰陽五行，這是可以的，是有進步意義的，是政治鬥爭的需要。……今文學別有個精神，就是『革命』。」<sup>51</sup>對蒙文通所說「今文學成了君主立憲的工具」，也要辯證地看，在當時維新變法運動中，維新派以「託古改制」說為依據，大力提倡進步的民主和民權平等思想，宣傳歷史進化論和社會進步論，批判沒落的封建君主專制主義，要求改革，實行君主立憲制，這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時代精神。這應該說是進步的，否則也不會遭到封建頑固派的極力反對，也不會出現為變法而流血犧牲的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康有為領導的變法維新運動及其「託古改

<sup>48</sup> 〈孔子和今文學〉，《蒙文通文集》第三卷，頁166。

<sup>49</sup> 同前註，頁167。

<sup>50</sup> 同前註，頁169。

<sup>51</sup> 〈治學雜語〉，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頁16。

制」理論已由進步轉向保守，以至落後，已不適應新時代發展的要求，而被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及其革命理論所取代。此時革命派對立憲派的理論進行批判，這當然是符合時代發展的需要。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康有為所提倡的今文經學理論的進步性。今文學除了有「革命」精神以外，還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思想體系，而「革命」精神也有它一定的適用範圍，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可以適合於一切時間空間的。蒙文通對今文學「革命」說的強調，當與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政治環境有關，他的思想之所以與廖平對廢經革命說的批評存在著差異，也與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政治環境不同於廖平時代相關。

質言之，廖平在經學研究上提出以禮制平分今、古文經學，後又尊今抑古，這對蒙文通產生了重要影響。蒙文通繼承廖平，積極闡發師說，擴大廖平經學的影響。他在繼承闡發廖平師說的過程中，也結合時代的變化，時時提出己見和新意，由此創新、豐富和發展了師說。除繼承廖平師說外，蒙文通思想中也有一些與廖平思想明顯不同之處，他不贊成廖平所說的古文經學本於劉歆作偽的說法，認為古文經決不會儘是劉歆所偽造，即古文經基本上不是偽造的，認定古文經在河間獻王時已有，或者說，古文經在河間獻王時已開始結合、逐步形成，到劉歆時則正式創立，肯定古文經學為兩漢經學之一脈。廖平、蒙文通二人經學思想的差異還表現在，廖平批評廢經革命說，蒙文通則批《公羊》學之改制說而主今文經學的革命說。蒙文通對《齊詩》革命說的認同，對《公羊》學及改制說的否定，是他評價從漢代今文學到清代今文學的一個重要標準，從中亦可見蒙文通經學與廖平思想的區別。蒙文通在經學研究中對今文學革命說的強調，以革命說作為評判學術是非的標準，與他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政治環境有關。反映了社會轉型時期的時代政治對經學的深刻影響，這是廖平、蒙文通經學思想之所以出現相同相異之處的重要原因。

